

# 2014 年牛河梁遗址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研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sup>1</sup>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sup>2</sup>

(1. 辽宁 沈阳市 110003, 2. 北京市 100872)

关键词: 牛河梁; 系统调查; 祭祀中心

摘要: 通过开展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 全面掌握了牛河梁遗址内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 重点分析了红山文化的生活遗存与礼仪建筑的分布规律, 通过与大凌河上游和赤峰地区的对比, 揭示出牛河梁遗址具有特殊的地位, 是整个红山文化的祭祀中心。

Key words: Niuheliang; Settlement Survey; Pilgrimage center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ritual facilities in the Niuheliang region reveal the nature of ritual life during the Hongshan Period. When compared to the Chifeng and the Upper Daling regions it becomes apparent Niuheliang might have played a special macro-regional religious role in Hongshan life as the pilgrimage cen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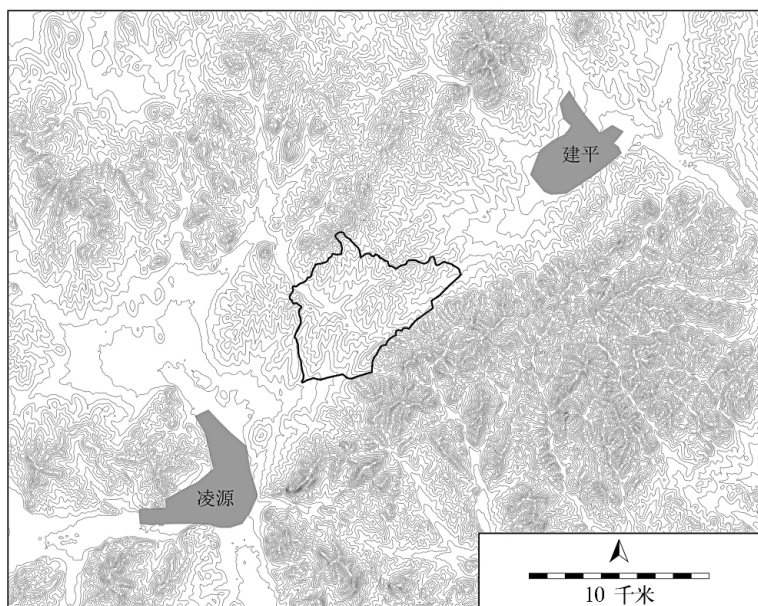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5.03.001

2014 年 6 月至 7 月,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合作, 对牛河梁遗址核心区开展了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研究, 调查总面积 42.5 平方千米。(图一) 现将调查情况及初步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一、调查目的

牛河梁遗址<sup>[1]</sup> 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市的交界处,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是单一的遗址, 而是一个遗址群。

自 1970 年代末开始, 在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三和第十六地点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主体是一个具有神庙性质的建筑和一个大型平台, 还有仓库性质的附属建筑和祭祀坑等; 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均为积石冢, 尤以第二地点积石冢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随葬品最丰富; 第十三地点则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在牛河梁遗址内, 神庙、祭坛、积石冢群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牛河梁遗址多种形式的礼仪建筑、精雕



图一 牛河梁遗址调查区位置及范围图

细琢的随葬玉器和纹饰绚丽的彩陶祭器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普遍认为红山文化已经产生阶层分化和社会分工，积石冢墓葬的主人被认为不仅掌握神权，而且还掌握政权，红山文化可能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为什么会在牛河梁遗址形成如此体系完备、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礼仪建筑群，它是红山文化所代表的人群朝觐的圣地吗？是否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拥有大规模的人口、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更多阶层的超大型社区呢？牛河梁遗址的礼仪建筑经历了长期的重建和扩建过程，大量的劳动力建造礼仪建筑、众多的人群参与礼仪活动，这样复杂的组织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这些问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亟待解决的。因此，弄清牛河梁遗址内红山文化的社区规模和形式是十分重要的，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

然而，我们对牛河梁遗址内的日常生活遗存却知之甚少。目前最主要的材料是第五地点下层遗存，发现了一批红山文化的灰坑，出土了一批可复原的陶器和较多的石器。由于第五地点的地层关系非常清晰和明确，为红山文化的分期研究和积石冢的发展演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第五地点的下层遗存早于积石冢、祭坛等礼仪建筑，二者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无法进行对应性研究。在第二地点和第十六地点虽然发现了少量可能与积石冢同时代的灰坑，但只是零星发现，出土遗物也很少，无法借此了解与礼仪建筑同时代的日常生活遗存的面貌。

以往在牛河梁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对红山文化礼仪建筑的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方面，而对红山文化日常生活遗存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是十分欠缺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是很不平衡的。本次调查的目的就是全面掌握牛河梁遗址内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总结各时期遗存的分布规律，观察人与自然环境的契合程度，考察古代文化动

态的发展过程。重点了解红山文化的日常生活遗存与礼仪建筑的分布规律，探寻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分析红山文化社区的规模、组织形式、互动关系，进而讨论宗教、礼仪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最终解决前面提出的重要的学术课题。

## 二、调查方法

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是一种密集拉网式的田野调查方法，把调查本身当成研究手段。重点关注人类遗存的空间分布、人口变化、社会结构、资源利用等问题。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这种调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很成熟的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方法。

在牛河梁遗址开展的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完全遵循标准程序。共组建了3个调查小队，每队3人，其中队长1人，队员2人。调查时使用比例为五千分之一、分辨率为2.5米的彩色卫星影像片，能清晰显示道路、沟谷、林地和农作物等，便于调查时迅速、准确定位。调查小队还携带手持式GPS接收机、照相机、采集记录表、1.8米长的绳子、标签、记号笔、自封袋等物品。

我们设想地面被分割成若干50×50米的方格，调查队员以50米间距行走。如果一名队员在50米距离内发现2块陶片，或者相邻的队员各发现1块陶片，那么这个50米方格即可确定为一个采集单位。在牛河梁遗址内，由于松林密布，沟壑纵横，调查时队员间距往往达不到50米，有时可能只有30米。因此，实际上只有部分采集单位是标准的50×50米方格，大部分是稍小的方格、长方格或者呈圆形、椭圆形等形状。总而言之，一切以调查队员的实际间距、陶片分布和地形情况为依据来确定采集单位的大小和形状。

如果一个采集单位的陶片密度较高，达到2平方米范围内有1块或1块以上陶片时，我们要作系统的地表采集。具体操作如

下：在采集单位中心划一个半径 1.8 米的圆圈（面积约 10 平方米），采集地表所有的陶片。如果采集的陶片少于 20 块，则在采集单位的一角另划一个圆圈进行采集。如果仍然少于 20 块，则再划一个圆圈采集，直到采集到 20 块以上陶片，但最多划 5 个圆圈。

如果一个采集单位的陶片密度小于每 2 平方米 1 块，就做一般性采集。需要采集所有发现的陶片，但是当达到 25 块陶片时即停止采集（通常达不到这一数字，而是发现多少就采集多少）。

在卫星影像片上画出采集单位的边界，写下采集单位的号码。填好采集记录表，注明与采集单位有关的地表遗迹。正常情况下，只采集陶片，不采集其他遗物，因此通常每个采集单位只有 1 袋陶片。如有特殊情况，采集了其他遗物，要注明其他遗物的口袋数量。

如果地表遗迹非常丰富，需要在坐标纸上加以描述并画草图。每个采集单位的边界、号码都要在图上绘出，以便确定遗迹的位置及其与地面采集的关系。

这样的方法为整个调查区域内的每个采集单位及各个时期的地表陶片密度提供了合理的度量。以便于开展后续的深入研究，如估算人口数量、分析古代社区规模、讨论社会组织结构等。

### 三、调查收获

本次调查共确定了 674 个采集单位，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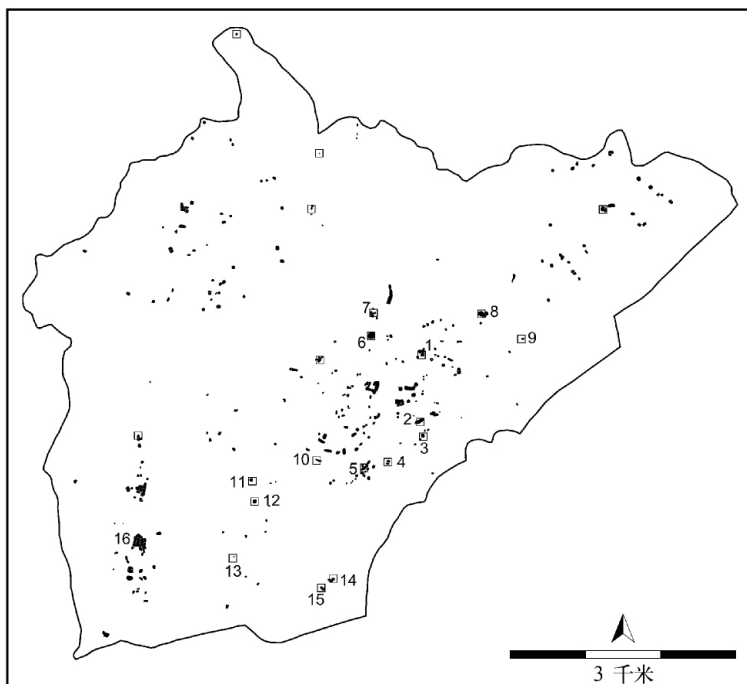
集陶片 5362 块，采集单位总面积 88.9 公顷。通过对采集陶片的初步统计分析，确立了采集区域的考古年代序列。调查区内没有发现早于红山文化的陶片，所以考古年代序列始于红山文化。由于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的陶片只发现了 1 块，所以本文暂将小河沿文化视为空缺，不计入序列。这样，排列下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就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汉代文化四个阶段。

#### 1. 红山文化（4500 ~ 3000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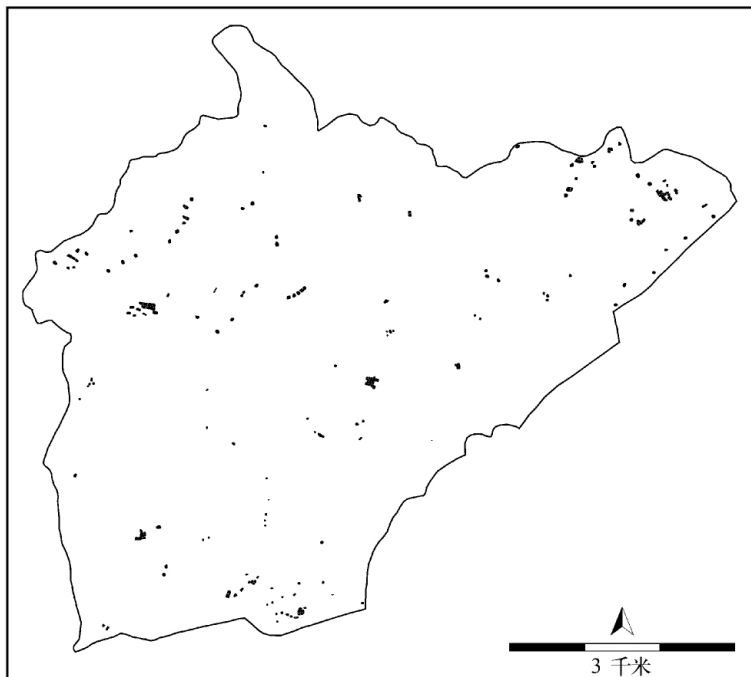
红山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调查区南部的东北至西南条带和西北部的中间区域，尤其是在第一至第十地点和第十六地点周边区域分布最为密集。采集红山文化陶片 1911 块，来自于 336 个采集单位，总面积 43.1 公顷。（图二）

#### 2. 夏家店下层文化（2000 ~ 1200 B. C.）

与红山文化相比，遗存分布形态比较散



图二 红山文化遗存分布图  
（带数字的方框为已经编号的礼仪建筑，无数字的方框为本次调查发现的积石冢）



图三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分布图

布。但是仍可看出在调查区的东北角、西南角、西北部和中部有四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采集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片 1689 块，来自于 204 个采集单位，总面积 29.8 公顷。(图三)

### 3. 夏家店上层文化 (1200 ~ 600 B. C.)

遗存分布密度与数量急剧下降，在调查区的中北部零星分布。采集夏家店上层文化陶片 279 块，来自于 23 个采集单位，总面积 3.5 公顷。(图四)

### 4. 战国汉代文化 (600 B. C. ~ 200 AD)

遗存分布态势与红山文化很相似，尤其是在调查区的西北部很集中。采集战国汉代文化陶片 1466 块，来自于 348 个采集单位，总面积 45.5 公顷。(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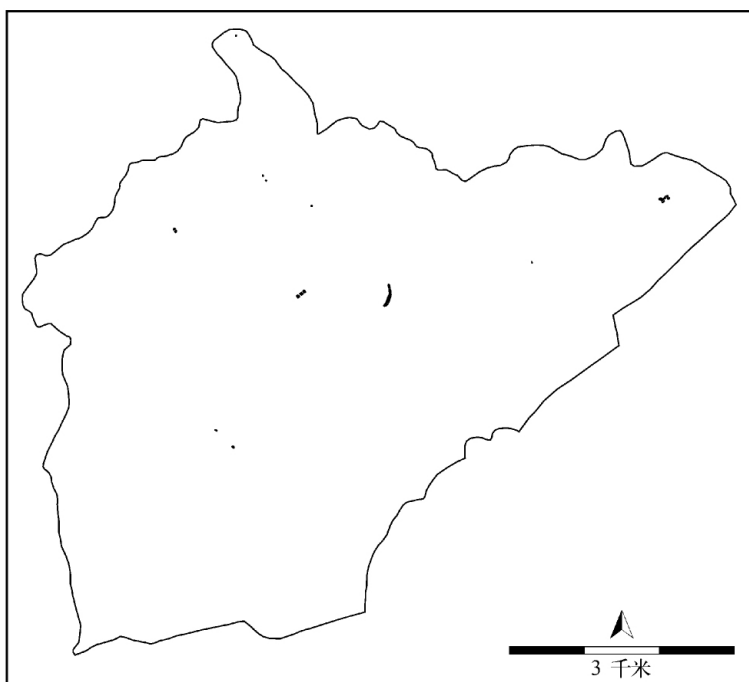
##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牛河梁遗址核心区开展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使用采集单位这一概念，可以非常准确地反映古代遗存的分布范围、陶片密度。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就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简要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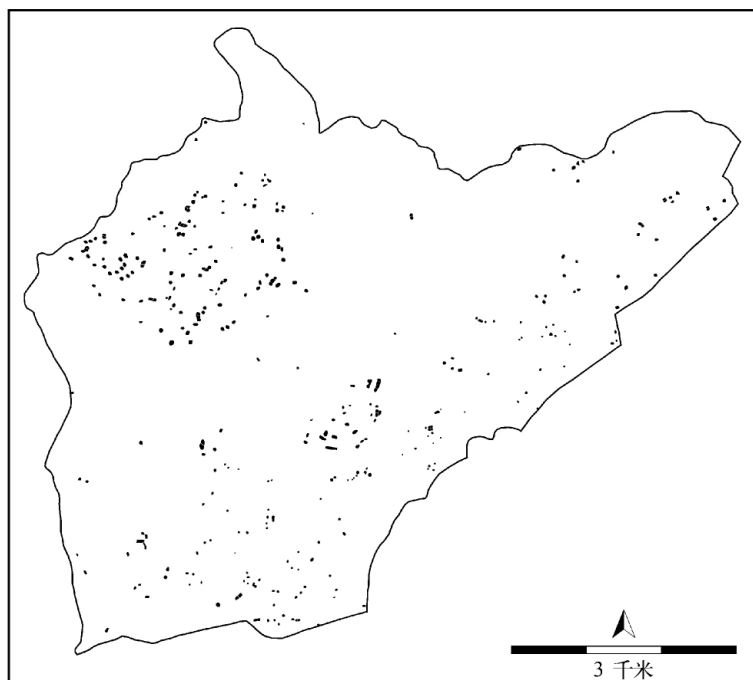
### 1. 不同文化阶段遗存分布的变化情况

通过比较可知，红山文化和战国汉代文化的遗存分布形式有近似之处，都是分布在调查区南部的东北至西南条带和西北部的中间区域，而且二者采集单位的数

量和面积也比较接近。但是差异之处也很明显，首先是采集到的红山文化陶片数量多于战国汉代文化，陶片密度较高；其次是在第



图四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分布图



图五 战国汉代文化遗存分布图

十六地点所在的山梁和第一至第十地点所在的区域内有大范围的连续分布的红山文化采集单位，表明有大型遗址的存在。而战国汉代文化的采集单位相对散布，没有显示出存在大型遗址；第三是在调查区的西北部，红山文化的遗存分布稀疏，而战国汉代文化遗存分布却很密集，采集单位之间没有很大的空隙，形成一个整体。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分布比红山文化和战国汉代文化显得疏朗和分散，采集单位的数量和面积都少于二者，但是采集陶片的数量却仅次于红山文化，拥有很高的陶片密度。在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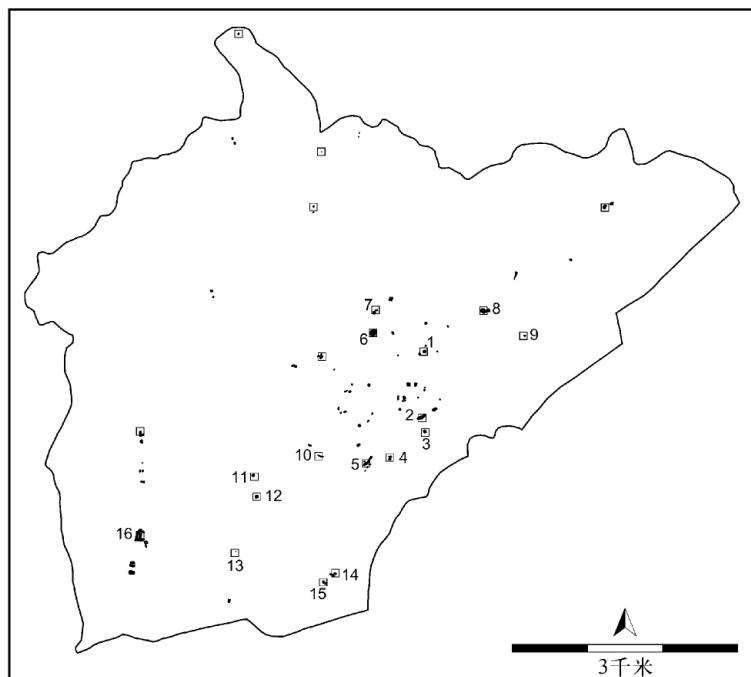
个地点存在采集单位连续分布的状态，意味着存在几处较大型的遗址。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分布极为稀疏，采集单位的数量和面积都是最小的，但是其陶片密度却是最高。在调查区的中部和东北部存在三个采集单位的连续分布区，对应着三个较大型的遗址。

## 2. 红山文化礼仪建筑与生活遗存的关系

在本次调查的 42.5 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原有已经编号的礼仪建筑 16 处，调查新发现 6 处（均可明确判定为积石冢或祭坛），合计 22

处。平均大约 2 平方千米就有一处礼仪建筑，可见其密度之高。此外，还在 40 多个



图六 红山文化筒形器分布图

（带数字的方框为已经编号的礼仪建筑，无数字的方框为本次调查发现的积石冢）

采集单位中发现了筒形器残片。(图六)筒形器是专用的祭祀陶器,通常围绕在墓葬和积石冢周围摆放,这就意味着可能存在更多的礼仪建筑或积石冢。对比图二和图六,可以观察到以下三个现象。一是在调查区的南部,即第一地点到第十六地点所在的区域,包含有18处明确的礼仪建筑,以及大量包含筒形器残片的采集单位,表明这里是礼仪建筑最集中的分布区。在这个区域的一些采集单位内,发现了日常生活陶器的残片。有些采集单位连缀成片,具有一定规模。这些生活遗存与礼仪建筑相间分布,具有关联性。二是在调查区的东北角,有一个积石冢,围绕着这座积石冢分布着红山文化的日常生活遗存,规模都稍小,采集到的陶片数量也不多;三是在调查区的西北部,分布着一片相对集中的红山文化日常生活遗存。包括一处由多个采集单位组成的区域,可以认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遗址,其余都是一两个采集单位的遗存分布点。在这片遗存的中间区域没有发现积石冢,在其东北部有2个小型积石冢,在其南部和北部分别有2个采集单位内发现了筒形器残片,似乎是生活区居中,周边围绕着小型的礼仪建筑这种布局模式。

### 3.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与周边地区的初步比较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美学者合作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sup>[2]</sup>和辽宁西部的喀左地区<sup>[3]</sup>开展了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研究。本次调查的牛河梁遗址与二者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面貌高度一致,这三个调查研究项目都是重点关注红山文化,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因此三者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在红山文化时期,三个调查区的人口、经济、宗教等方面都获得了发展,但是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牛河梁调查区的礼仪建筑数量多、规模最大,显示出特殊地位;喀左调

查区的礼仪建筑的数量和规模次之,拥有东山嘴祭祀遗存这类高等级的建筑;赤峰调查区的礼仪建筑的数量少、规模小。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牛河梁遗址和喀左大凌河上游地区属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区,而赤峰调查区属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

在赤峰和喀左调查区,虽然社区的规模有差异,但其形态、组织和作用是极为相像的。社区的分布范围方圆几千米,有自己的礼仪设施,人口向中心集中。彼此相互独立,没有明显的政治或经济一体化,但是也存在跨区互动。而在牛河梁调查区,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景。在调查区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各存在一个红山文化社区。社区的中心或周边有积石冢,遗存分布呈松散状态,与赤峰和喀左调查区相似。而在调查区的南部,礼仪建筑高度集中分布,形式多样,规模又十分巨大。礼仪建筑之间存在的的生活类遗存,其作用很可能只是为了满足建设、修缮礼仪设施,管理祭祀器物和组织礼仪活动之需。我们没有看到存在一个拥有这些礼仪建筑的超级社区。所以,我们认为牛河梁遗址更可能是整个红山文化的祭祀中心,是红山文化所代表的人类群体朝觐的圣地。

2014年在牛河梁遗址开展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的范围较小,对调查结果的研究也是初步的,得到的收获和认识并不全面。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对牛河梁遗址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

(本项目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执 笔: 吕学明 熊增珑 郭 明  
调查人员: 吕学明 熊增珑 郭 明  
张春坤 袁金生 杨天源  
余俊英 冯 宝 张诺慈  
陈 畅 白 芸 窦欣然  
常 璐

(下转 62 页)

第二,淳化城位于黄土高原之上,西、北两面枕山,东侧临河,一条南北大街贯通城内,衙署、庙学等重要建置沿大街次第分布;自宋初置县以至明清,规模和格局都没有大的变化。淳化城的选址受到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构筑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小区内。城垣或依山而筑、或临水而营的做法也明显考虑了防御的因素。这样的地方城址选址和格局,在北方黄土高原地带似具有一定的共性,笔者曾调查的建于宋代的山西省乡宁县城也属此类。

第三,淳化城宋初置县以前已有城,但从文献记载分析其规模不会太大。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能清楚地说明唐代梨园镇的规模,下一步似可针对唐代梨园镇进行部分考古工作,其中应格外注意唐代梨园镇的城垣范围,特别是宋以来淳化城的南垣之下是否叠压了早期城垣。此类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我们修正现有认识,匡正工作方法,并进一步促进对淳化城和此类城址的研究。

[1] 《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 《輿地广记》卷

十四·陕西永兴军路下、《宋朝事实》卷十八·升降州县一、《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輿地考八、《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类编长安志》卷七之镇聚所述与此略同或较简,不复赘。

- [2] 笔者在淳化进行现场调查时,未见到此碑。按2000年版《淳化县志》记《吏隐堂题记》刻于政和四年,不确,应为宣和七年。
- [3] 淳化县志编纂委员会. 淳化县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990.
- [4] 同 [3]: 991, 992.
- [5] 同 [3]: 987.
- [6] 同 [3]: 988.
- [7] 同 [3]: 990.
- [8] 淳化中学出土的钱币窖藏和县医院所出土的宋代钱币,现存淳化县文博馆。此俱承淳化县文博馆姚生民先生于笔者在淳化调查时见告,谨致谢忱!另据姚先生推测,淳化中学所出钱币窖藏应为一金代窖藏。
- [9] 同 [3]: 987, 988. 笔者在淳化进行现场调查时,于县文博馆院内见此两幢,皆翻覆于地,大顺二年幢《靖难军梨园镇新修禅院尊胜经幢铭记》未能见识。大顺二年幢两截中较短一段,在靠近幢身上端遭破坏,钻有一圆孔,直径约5厘米。
- [10] 同 [3]: 533.
- [11] 同 [3].
- [12] 同 [3]: 534.

(责任编辑: 辛 革)

(上接8页)

-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本文中关于牛河梁遗址的基础资料均采自此报告。
- [2]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 美国夏威夷大学. 辽宁大凌河上游流域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 2010, (5). 柯睿思, 吕学明, 周南, 朱达. 大凌河上游流域红山文化区域性社会组织. 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中心, 2014.

(责任编辑: 方燕明)